

浙江文叢

張可久集校注

〔上册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 張可久集校注

〔上册〕

〔元〕張可久著 吕薇芬 楊鑑校注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# 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可久集校注 / (元) 張可久著；呂薇芬，楊鑣校注。—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.11

(浙江文叢)

ISBN 978-7-80715-439-6

I. ①張… II. ①張… ②呂… ③楊… III. ①散曲—作品集—中國—元代 IV. ①I222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38987 號

## 張可久集校注

(元)張可久 著 呂薇芬 楊鑣 校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[www.zjguji.com](http://www.zjguji.com)

責任編輯 吳 迪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賈 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41.25

字 數 422 千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439-6

定 價 200.00 圓(精裝)

ISBN 978-7-80715-439-6

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9 787807 154396 >

## 重版說明

自從《張可久集校注》一九九五年出版以來，得到同行和讀者的關心與肯定，使我們感到欣慰和感激。這也說明大家對張可久這位元代散曲家的重視。的確，他是一位作品數量最多，成就很高的散曲作家，是元散曲清麗一派的領軍人物。他不但影響了元代後期的散曲創作，而且對明清兩代的散曲創作，都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，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成爲不少作家的典範，被奉爲不凡的圭臬。

散曲作爲一種後起的比較通俗的詩歌形式，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。《張可久集校注》初版時，散曲研究還是一個小分支。浙江古籍出版社將此書列入《兩浙作家文叢》，說明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看法有一種全局觀和前瞻性。這次重版并列入《浙江文叢》，是對散曲研究的推動，是值得欣慰的事情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散曲研究已經有了不可忽視的發展，有一支年輕的有生氣的研究隊伍，有一批有品質的研究成果。同時我們也驚喜地發現，有一批用這一古典詩歌形式創作的散曲愛好者，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刊物。無疑，《張可久集校注》的再版，對散曲研究與散曲創作，都會有所助益。

這次重版有機會讓我們審視初版本的不足之處，借此以校正和補充。我們做的工作，大

致如下：

(一) 改正錯字，規範標點。

(二) 注釋。本書不作字詞解釋。而對人名、地名、典故作簡要注解，盡量注出處。這次，補充了一些條目，糾正了一些不夠準確的地方。

(三) 曲的格律。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。格律是在衆多作品中歸納出來的，而歷史上曲譜之作已經十分衆多。各譜是由曲家個人對曲作品的格律進行歸納分析，并結合個人對曲的理解和實踐經驗而訂立的。所以，各譜對曲牌格律的釐定有些差異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曲牌有正格，也有變格，因為作家的創作過程和創作環境是複雜的，激情的激揚或會突破格律。本書對格律的分析主要依據《北詞廣正譜》和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》。對於張可久作品中格律出現變化的時候，本書作了必要的說明。本書對作品分出正字和襯字，以便讀者對曲的體裁和作品本身有更好的理解。這次又對正襯的分別，作了核對和修正。

雖然我們在重版過程中，作了一些補充和修正，但是時間倉促，加之本身學識和學養的局限，必定會有不足之處。願讀者多多指正。

呂薇芬 楊鑱  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

## 前 言

張久可（約一二八〇—一三四九以後），字可久，號小山，以字行。元慶元（今浙江寧波）人。他雖是元代重要散曲作家，但一生沉抑下僚，生平事迹隱而不顯，僅一鱗半爪略見於典籍，只能以此作為搜尋之線索。對於張可久生平的考索，孫楷第先生《元曲家考略》首建功勞，繼後羅忼烈、楊鑣、寧希元等先生的文章，又將此成果擴大<sup>[一]</sup>。至今，其名、字、號，生卒年，以及仕歷中的一些問題已有定論；當然，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商榷。我們在校勘張可久作品並搜尋有關材料時，也有一些新的收穫，但願我們的研究能對張可久的研究，乃至元代散曲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### 一

最早較全面地記載張氏生平資料的典籍，乃是鍾嗣成《錄鬼簿》，雖僅寥寥數語，但其所言里籍、仕履，已為世人所共識，因其乃當時記載，較為可靠之故。但因此書流傳版本不同，對張可久之名、字，產生異說。明《說集》本以為張氏名「久可」，其餘各書則皆作名「可久」。嗣後，明清人又有不同說法。明蔣一葵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七十一云：「張伯遠，字可久，號小山。」《四

庫全書總目》存目，《張小山小令》提要云：『張可久，字仲遠，號小山。』清人董沛《甬上宋元詩略》卷十四收有可久詩，其小傳云：『張可久，一名大可，字伯遠，號小山。官路吏轉首領。著有《小山小令》。』綜上所說，張氏之名有『可久』、『久可』、『伯遠』、『大可』說；字有『可久』、『小山』、『伯遠』、『仲遠』等說。

衆說之中，除《錄鬼簿》一直為世人重視外，《堯山堂外紀》「名伯遠，字可久，號小山」一說，影響頗大。不但在小傳中作如是說，并且還引可久《沉醉東風》小令，謂『張伯遠九月九日見桃花，作小令』，言之鑿鑿，極為肯定。此後，朱彝尊《詞綜》、《御選歷代詩餘》、袁陶軒《四明近體樂府》、董沛《甬上宋元詩略》、張宗櫟《詞林紀事》等書，均沿此說，但改作『字伯遠』，蓋因『伯遠』類字不類名之故。近人任訥輯《小山樂府》時，在『諸家評論』中引蔣一葵此說，并加按語，《元音》有張伯遠《和祝直清》五古一首，不知即小山作否？對此已存懷疑。據我們考察，蔣一葵此說實誤。元代詩人張立仁，字伯遠，號楚間，并有詩集行於世，惜早散佚，顧嗣立《元詩選》也未收入。元人李存《仲公集》卷二十有《張伯遠詩集序》，序中說：『僕兒時聞諸父間，言伯遠能詩，……其仲子昕輯所為詩若干卷，傳之四方。……伯遠姓張，諱立仁，世為鄱陽詩書家云。』其詩今散見於他集中。任訥所引《和祝直清》即是其一。可見張伯遠另有其人，并非可久。元人蔣昌輯《元風雅》卷二十八列『張可久』，卷三十列『張伯遠』，也可知元人文獻中，并未將二人混作一人。看來是因為『可久』與『伯遠』意義相關，而且二人皆『老死丘壑而

無所遇』（李存《仲公集》），其境遇又相同，後人纔混作一人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張可久『字仲遠』，却不知其據。但其所存目《張小山小令》二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却是『明初宋濂得其詞半冊於禮賢館，後方孝孺又購得鈔本一帙以示濂，乃參互校正，分爲上下卷，鏤版行世』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），應是可靠版本。『總目』對版本敘述較詳，估計此書有序。可久的字或是據『序』。宋、方二人離元季時代較近，又都是大家，若此，則必有所據。惜此書未曾得見，不知其詳，特此存疑。

其實，小山名、字究竟爲何，元人集中早有記載，元人鄭玉《師山集》卷四《修復任公祠記》中有『四明張久可可久監稅松源，力贊其成』一語<sup>[2]</sup>，道出了小山名久可，字可久的事實。此外尚有三則材料可證其可靠性。一是上所引《說集》本《錄鬼簿》中所記小山名爲『久可』。《說集》本在今存《錄鬼簿》版本中，年代較早，應有重要參考價值。因曲家常以字行，則別本作名『可久』也可以理解。其二，天一閣藏《小山樂府》最後一則小山自作之跋語，署爲『至正丁亥良月張久可書』。其三，清人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卷三十二著錄有『張久可《張小山小令》二卷』，其名也爲『張久可』。可見張氏名『久可』的說法，由來已久，也并非新發現，但一直被人們所忽略。

此外小山還有名『大可』、『九可』之說。清董沛《甬上宋元詩略》卷十四，收小山詩《題趙孟頫飲馬圖》（詩出於清人高士奇《江村銷夏錄》卷一）題名『張大可』，小傳中也說：『一名大

可。」此誤很可能源自天一閣舊藏《小山樂府》，小山自作的跋語，署名潦草，「久可」形似「大可」，我們目睹此原件，深為理解。「九可」則出自《玉山名勝集》，中收可久之詩，署名為「久可」，而別本署為「九可」，當是音誤。

明《說集》本及曹本《錄鬼簿》以為「小山」為張氏的字；清人袁陶軒《四明近體樂府》則以為「字伯遠，一字山」。除此外，則陳焯《宋元詩會》、董沛《甬上宋元詩略》、朱彝尊《詞綜》、張宗櫟《詞林紀事》、席世臣補輯《元詩選癸集》皆以「小山」為號。既然《師山集》以「可久」為字，已無疑問，則「小山」應是號。古人常據本名涵義另立表字，「小山」與「久可」却并不相關，《小山》為號恐無疑問，當是欽佩晏小山而以此為號。然而，袁陶軒《四明近體樂府》卷七引《西廬詞話》為據，指出：「小山在（慶元）城北隅，倪氏有園庭極盛。伯遠（指可久）以小山自號，當必城北人。」此說晚出，當否尚難判定，此備一說。

可久之生卒年雖不能確定，經考證已能知其大約。《錄鬼簿》將他列為「方今才人相知者」，可久又稱馬致遠為先輩，知他為元後期作家。其生年之最可靠證據為天一閣舊藏影抄本《小山樂府》中貫雲石為其所寫之序文，此序作於延祐己未（六年，一二一九）。序中說：「小山以儒家讀書萬卷，四十猶未遇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四十為約數，則小山生年當在一二八〇年左右。

考小山生卒年，元人李祁《雲陽集》卷四《跋賀元忠遺墨卷後》一文，最為重要，此文首先由孫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引證。其文謂：「因記余在浙省時，領省檄督事昆山，坐驛舍中。張率

數吏來謁。一見問姓名，乃知其爲小山也。時年已七十餘，匿其年數，爲昆山幕僚。遂與坐談笑，仍數數來驛中語，數日乃別。別時，復書其新詩十餘首來。』這是一則記載可久晚年行踪的重要材料。要知可久的生卒年，就需知李祁何時與可久見面。

李祁，茶陵州人。元統元年（一三三三）左榜進士第二，授應奉翰林文字，以母老就養江南，改婺源州同知，遷江浙儒學副提舉。以母憂解職。孫楷第在《元曲家考略》中指出李於至正四年（一三四四）始任江浙儒學副提舉。徵引《金華黃先生文集》卷十《杭州路儒學興造記》（至正七年著），文中說：『至正二年學齋毀於火。四年夏，儒學提舉班公惟志俾執事者度木簡材，而李君祁來爲副提舉，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。』孫楷第又說，今所見元官本《宋史》以至正六年刊於杭州者，其書前載中書省至正六年咨江浙等處行中省文，以及行省提調官銜名，其儒司提調官司中，有『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』，可知李祁至正六年（一三四六）在官。孫楷第的考證給人以啓發，據此，我們又在《雲陽集》找到材料。《雲陽集》卷九《書郝氏紫芝亭卷後》云：

至正丁亥（七年，一三四七）予忝司江浙儒學提舉，仲舉（張翥）奉朝廷命來鏤宋、金二史於杭，且命儒司官佐董其事，故予得與仲舉同硯席起居者半年。後三年，予憂居姑蘇，而仲舉再奉旨祭神海上。

可知至正六年朝廷下命令在杭州刊刻宋、金二史、張翥於七年抵杭，主持此事，與李祁『同硯席

起居半年』。『後三年』即至正十年（一三五〇）李祁丁母憂居姑蘇。則李祁在昆山見到可久，必在至正十年之前。

上已引元人鄭玉《師山集》卷四《修復任公祠記》，知張可久在新安城修復『任公祠』時，尚監稅松源，而鄭玉此文作於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可知當時可久尚在松源任上。以此推斷，李祁會見可久必在至正九年至十年間，上推生年，正與貫雲石《序》所言璧合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資料也可證明可久生年。現存可久詩中，有《題顧仲瑛芝雲堂》、《早起口占寄玉山（即顧仲瑛）》兩首。顧仲瑛即元人顧瑛，號金粟道人，昆山人，家豪富，是江南著名文壇盟主。其居室玉山草堂，與倪瓈清閑閣齊名。據其自著《墓志銘》，說他年逾四十，在舊邸之西，重築亭園，名『玉山佳處』，《芝雲堂》乃其中一景。顧氏四十歲乃至正九年。元人鄭元祐《僑吳集》卷十有《芝雲堂記》記其事，此記作於『至正己丑（九年，一三四九）秋八月望日』。後芝雲堂毀於火，所藏之書俱焚，謝應芳有七律一首《聞顧玉山芝雲堂火，而所藏之書俱焚，恐其不能爲懷，寄詩釋之》（《危巢集》卷三），此乃後話。但當時芝雲堂却是文士們經常聚會的地方。其《墓志銘》又說：『至正九年，江浙行省以海宇不寧，又闢貳昆山事，辭不獲，仍以侄良佐代任焉。』則可久與顧瑛侄同衙共事，得與顧瑛來往，事也在至正九年以後。

可久卒年不得詳知，從以上材料來看，必卒於至正十年以後。

寧希元《張可久生平事迹考略》用力甚多，給人很多啓發，但也有些結論與我們意見相左，

可久卒年即是其一。寧希元認爲張可久卒於至正十四年（一三五四），現已有一些學者將此作爲定論，故不能不辨。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元人倪瓈爲所作《秋林野興圖》所寫兩則題識〔四〕：

余既與小山作《秋林野興圖》，九月中，小山携以索題。憶八月望日，經鋤齋前木犀盛開，因賦下韻。今年自春徂秋，無一日有好興味，僅賦此一長句，錄左方。（詩略）己卯秋九月十四日，雲林生倪瓈。

又：

今年歲在甲午，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。陸益德自吳淞歸，携以相示。蓋藏於其友人黃君允中家。余一時戲寫此圖，距今十有六年矣。對之悵然。

（皆見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）

寧文以爲此第二題文，從語氣來看，「自當作於可久卒後不久，故有物是人非、恍如隔世的感嘆」。平心而論，此題文確有滄桑之嘆，却無悼念之意，且連小山之名都未提及，無法作爲可久卒年之確證。此畫原應在小山手中，因而在第一則題詞；然而十六年後，此畫却藏於吳淞黃家，似早已不在小山處，故有一『藏』字。這期間存在多種可能：是小山轉贈黃氏？或是小山宦途奔波，途中遺落而入黃家？當然，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性，即小山十分寶愛此畫，隨身攜帶，死後散落吳淞黃家。吳淞離昆山很近，若這種可能存在，小山倒有可能卒於昆山任上了。

然而，若小山新亡，黃允中得此畫，又由友人携至倪瓈處，必將小山亡故消息帶去，倪、張二人是故友，不可能不提此事。那麼題文中就不會僅僅有『對之悵然』四字了。所以小山卒於至正十四年只是猜測，不能作爲定論。

## 二

關於張小山的經歷仕途，四十歲之前不見有何種記載。貫雲石延祐間爲小山《今樂府》寫的序文，乃是小山生平重要的材料，知他當時年約四十而未遇，但散曲創作却已頗有成就。小山雖是慶元人，但他作品中却無描寫甬上風物的篇製，或許慶元只是祖籍，已無產業，也無親屬。

從他的散曲作品中可以知道他曾客居平江路吳江、蘇州、吳淞一帶。寧希元文章中舉小山〔中呂·紅綉鞋〕《寧元帥席上》，從而考證他客居吳江是在青年時期，這是有道理的。寧元帥即寧玉（一二三六—一三〇二），孟州河陽人。《新元史》、《蒙兀兒史記》皆有傳。中統元年爲河道官，後從伯顏伐宋，以功除管軍千戶，佩金符。後遷管軍總管，擢浙西道吳江長橋都元帥兼沿海上萬戶。至元二十三年以病乞歸。未幾，朝廷令玉從鎮南王討交趾，師至安南，玉病甚，以子居仁代，遂歸至吳江，大德六年（一三〇二）卒。據此，小山這一小令必作於大德六年之前，當時可久年僅二十挂零，小令中有『少年誰識故侯家』句，也可爲證。

小山另有〔雙調·折桂令〕《疏齋學士自長沙歸》，中有『望仙華十二芙蓉，夜醉長沙，曉過吳淞』句，可證明他曾客居平江路。今可考知此曲作於何年。盧摯是元代著名詩人、文學家，也是一位有影響的散曲作家。約生於一二四二年，卒於一三一五年以後<sup>〔五〕</sup>，曾任江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等職，以集賢學士出爲嶺北湖南道廉訪使，拜翰林學士，遷承旨。可久此曲當是盧摯自長沙繞道吳淞等地，入朝爲翰林時，爲歡迎盧摯而作。吳澄有《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》一文，云『盧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，由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』。與可久曲中『夜醉長沙，曉過吳淞』句合，當無誤。

那麼，盧摯是哪年進京的呢？危素《臨川吳文正公年譜》記：『大德七年（一三〇三）癸卯春，（吳澄，即文正公自京師）治歸，五月己酉至揚州。……淮東宣慰使珊瑚公玠、工部侍郎賈公鈞、湖廣廉訪使盧公摯……具疏致幣率弟子致揚州，請公講學。』則知大德七年盧摯仍在湖南任上。

又，《元文類》收盧摯《東宮正殿上梁文》，中有『玉冊金文，既正重黎之位；桂宮蘭殿，載新淳震之居』，乃指太子新立之事。據《元史·成宗紀四》知大德九年，立皇子德壽爲皇太子，詔告天下。爲使太子有『師賓接見之所』（盧摯《東宮正殿上梁文》），於是大興土木，修東宮正殿。以此，該文應作於大德九年，則盧摯入朝乃大德八年。小山小令中有『鶴唳黃雲半空，雁來紅葉西風』句，時令仍在秋季。小山大德八年在平江路由此可證。

盧摯從長沙入京，自可由陸路經湖北、河南抵京，改走水路經吳淞入京乃是繞遠，目的可能是一游吳地。小山作品題爲《疏齋學士自長沙歸》，一「歸」字值得玩味。盧摯曾任江東道憲使，江東與平江同屬江浙行省，故有此『歸』字。小山自是以江浙行省臣民自居。值得考慮的是，小山當年纔二十挂零，却能與寧玉、盧摯等元帥、憲使來往，很是難得。若不是在衙門當差，必得有勢力者援引不可。但小山一生坎坷，似無此援手。他晚年有小令《水仙子》《歸興》寫道：『淡文章不到紫薇郎，小根脚難登白玉堂，遠功名却怕黃茅瘴。』很準確地道出他一生遭際。因此他青年時曾在平江路某衙門當過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小山與盧摯的一段交往，對他的一生具有很大影響，很有必要作一番探究。今存小山散曲中，與盧摯有關的作品共八首。但這八首小令却非作於同一時間。上述《疏齋學士自長沙歸》寫在秋天，而《折桂令》《湖上懷古次疏齋學士韻》（中有『趁夜雪歸鴻，暮苑啼鴉』句）、《紅梅次疏齋學士韻》（有『快傳語花神，換却南枝』句）、《和疏齋學士韻》（有『愛疏翁不放春閑，……花老南枝，雪深西圃』句），可知時令在冬春之交；還有一首《小桃紅》《憶疏齋學士郊行》，所憶也是在這一時令，與盧摯在西湖游賞的往事。大德八年秋盧摯繞道上京來江浙一帶，不可能逗留到冬、春之交，可見小山與盧摯的交往不止一次。那麼小山與盧摯在大德八年後仍有過交往。

松泉老人《墨緣彙觀錄》卷二，著錄唐歐陽詢《化度寺塔銘冊》，上有元、明諸名家題識，其

中有：『元大德間嵩翁盧摯、太原劉致時中、醴陵李應實仲仁觀於宣城寓居之疏齋。』證明了盧摯後來曾寓居宣城，時間自在是至大德九年之後。

盧摯在至大二年（一三〇九）作有《三皇廟碑》（見《永樂大典》卷五七七〇）。《潭郡》於至大元年秋始修復《三皇廟》，於至大二年春建成。碑文中說道，廟成之後，湖南宣、憲兩府書其事，併以宣屬吳掾思義來宣請記，盧摯因請而成此文，可見盧摯至大二年春寓居宣城。又，盧摯有小令《蟾宮曲》《肅政黎公庚戌除夜得孫，翌日見招，作此以賀》，中有『快傳語江東縉紳，勝歌謠天上麒麟』句，不用細考，此肅政黎公必是江東道廉訪使。庚戌即至大三年，即撰《三皇廟碑》次年，《翌日》則已是至大四年的新年了。

又，據《元史·揭傒斯傳》記載：『延祐初，（程）鉅夫，（盧）摯列薦於朝（薦揭），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。』則盧摯延祐初又返京爲官。他官至翰林承旨，此次進京可能拜此官職。另，盧摯有小令《沉醉東風》《舉子》也值得注意。仁宗於皇慶二年（一三一二）下詔重開科舉；三年，天下郡縣『舉其賢者、能者，充賦有司』（皇慶三年即改元爲延祐元年）。延祐二年（一三一五）各地舉子會試京師，三月廷試，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。又因是『重開科舉』，故破格降恩，賜會試舉子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；六十以上府、州教授；其餘皆山長、學正等官司。京城盛況空前。盧摯應是目睹此盛況而寫《舉子》小令，也可證明他延祐初已在京。

盧摯行踪既明，我們便可以推斷，至大間小山與他又有交往。小山小令中所涉及地點，多

在杭州，故可能是盧摯寓居宣城期間曾游杭州，纔與小山有多首唱和之曲。另外，小山還有一次與疏齋共游茅山的經歷，寫出了「紅綉鞋」《茅山疏翁索賦》。我們考證盧摯與小山的交誼，是為了尋找小山的踪迹，至此我們可以說，至大年間小山大約生活在杭州。也可能正是這段時間內，小山與馬致遠結交。馬有《湘妃怨》《和盧疏齋西湖》四首；可久有《慶東原》《和馬致遠先輩韻》九首，似都作於此時。

小山與劉致的交往大約也始於此時。關於劉致的生平，學者們考證頗多，并有不同看法，主要分歧在太原劉致（或以爲石州寧鄉人）與古洪劉時中是否一人。我們認爲并非一人。劉知漸《元曲家劉時中研究中的問題》（《重慶師院學報》一九八九年第四期）說元代至少有五個劉時中，考據甚確。而與張可久交往的是太原劉致時中，曾爲可久寫過《吳鹽》的序。這個劉致於大德二年於長沙拜會姚燧，受姚賞識，後推薦給新任湖南憲使的盧摯，用於幕府。有這一層關係就不難理解盧摯曾與劉致在宣城寓所共觀《化度寺塔銘冊》了。據《姚燧年譜》記載，姚於至大四年七月至杭州，劉致隨侍，并有《山坡羊》《侍牧庵先生西湖夜飲》等作品問世。小山與劉致的唱和之作，也當有一部分作於此時。劉致於至治二年，由河南掾進京任太常博士、翰林待制。據劉知漸文考證，他至順三年猶在京，則任江浙行省都事必在至順三年之後，那時小山與他又有交往。

小山在至大、延祐間與貫雲石結識，這又是他一生經歷中的一件大事，在這段時間內，又